

主编 赵靖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修订本

主编 赵靖
副主编 石世奇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赵靖主编. —修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8

ISBN 7-301-05774-1

I. 中… II. 赵… III. 经济思想史—中国 IV. F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9185 号

书 名: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修订本

著作责任者: 赵 靖

责任编辑: 梁鸿飞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774-1/F·0538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0672 邮购部 62757515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74 印张 180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48.00 元 (全四卷精装珍藏本)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仓廩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

修订本编辑说明

我社在 1991—1998 年出版了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1—4 卷。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部鸿篇巨制。作者独具匠心,呕心沥血,八年磨一剑,完成了这一部纵贯数千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史学著作。由于出版时间跨度大,原版各卷编辑体例和排版风格不尽一致。为了进一步丰富祖国珍贵的学术思想宝库,弘扬中华传统经济思想文化,展现这部巨著的完整风貌,我社于 2001—2002 年组织本书作者对原版进行全面修订并将 4 卷合为一部。在修订过程中,对各卷遗错一一加以订正,统一了体例。为使版式更加美观,也为了方便读者使用,特将正文注释置于各章之末。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所引史料极其丰富。在编辑过程中,责任编辑对本书史料及论述中因时代原因所致的语言差异采取了以下处理方式:

一、为了保持史料的真实性,凡古文中的通假字均予保留,并未据现代汉语用法加以更改;凡引述古人的话,也尽量使用原来的文字。

二、若干古字虽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但为使史料承传有据,仍以电脑造字技术加以补救,使其呈现原貌。

三、史料中所涉数字均依汉字排出,而为了适应现代语言文字发展的要求,著者分析论述中所用数字则尽量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2 日

序 言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版于 1991—1998 年分 4 卷陆续出版。此次修订,将原书 4 卷合为一部,一次推出,但仍保留原来 4 卷的建制,作为一部统一著作的各个组成部分。

为便于读者了解全书概貌,于书的开端写一篇涵盖全书的序言,并将全书 4 卷的目录系于序言之后。为便于读者查阅,全书各卷均排出此目录。同时,在每卷开端写一“卷首语”,对本卷的内容和特点作简要的、概括的说明。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范围从夏、商、(西)周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时间跨度达 4000 年之久。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经济思想。它是在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或者基本上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的情况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中国同域外经济、文化的交往,早在秦统一以前就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某些外来文化(例如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曾对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经济思想,在鸦片战争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却未受到外来的多大影响,而主要是在自身的历史条件和自身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中,中国的经济思想传往国外,并对所在国(尤其是一些东亚邻国)发生影响,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在鸦

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思想中,却很难找到外来经济思想的痕迹。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经济思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也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周围交往较多的国家)更发达。这种情况使得当时的中国很少需要为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而向外国寻求思想、理论方面的帮助,从而使得外来的经济思想少有传入并影响中国经济思想的可能。

本书取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通”有二义:一是时间上的连通,二是思想内容方面的贯通。

时间上的连通指本书的论述范围自始至终遍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只限于这一过程的某个段落或某些段落。思想内容方面的贯通则是指力求找出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能够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中对其基本内容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把握其内在的联系。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1〕。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对“通”的要求兼包这两个方面,而更致力于后者。如果只是把中国历史上浩瀚的经济思想资料搜集到一起,按时间顺序编列起来,是做不到“通古今之变”的。它充其量只能对研究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完成一定的资料准备工作,而不能写出真正意义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要在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中实现“通”的要求,研究方法的问题至关重要。没有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纷繁的、变幻无常的现象中把握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就不可能从事物的发展、运动的过程中,揭示出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就无法在庞杂的、充满着矛盾和混乱的研究资料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分析工作。对于像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一门涉及漫

〔1〕《报任安书》。见《前汉书·司马迁传》。

长的历史时期且文献资料有如汗牛充栋的这样一门学科来说,研究方法问题关系尤为重大。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对各门社会科学普遍适用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经济思想史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它不能代替后者。但是,中国经济思想史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却只有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才能创立起来。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首先就要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把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思想,看作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看作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思想是人们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反映人们对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人们在自己的经济生活中经常地、不断地接触各方面的经济问题,并通过反复的接触对这些经济问题中所包含的经济关系逐渐有所认识。这些认识就表现为一些特定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这些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就是构成各时期经济思想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材料。

各时期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状况,反映着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经济思想发展水平: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越是简单和直观,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是缺乏,它们彼此越是处于零散、孤立的状态,其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就越低;反之,这些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在反映经济关系方面越是深刻,越是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性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越密切,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就越高。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或发展程度看,经济思想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经济学。

(一)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人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主要表现为某些零散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对它们之间的

联系很少认识,或只看到某些粗浅的、表面的联系。

(二) 经济学说:人们在表达对某些经济问题的认识时,已能使用多方面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某些深层的、有因果关系的联系,能够对这些观念、原理及范畴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一定的说明、分析和论证。这些分析、说明和论证,已大体形成了某种体系。

(三) 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止在某些方面已形成系统的经济学说,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理论认识已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生产力低下,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经济关系都比较简单,同时,由于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各地区、各经济单位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均不密切,因而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不可能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的经济学。现代意义的经济学〔1〕,是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纪后才出现的。

中国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前,长期停滞于封建主义历史阶段,而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而经济思想的发展也长期处于经济学形成以前的阶段:经济思想主要以水平参差不齐、涵盖面广狭不同的经济学说的形式存在;同时,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也相当大量地存在着。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发展均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经济思想在很长时期中也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探讨的经济问题范围之广,保存下来的经济思想资料之多,以及经济学说、经济思想所达到的深度和完整性,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遗产中,都是值得赞叹的。

〔1〕中国古代早就有“经济学”的名称,但当时所谓的“经济学”是指“经世济物”或“经国济民”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是不相干的。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思想,不仅在程度和水平方面有差别,在性质和内容方面也是各有不同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史,必须首先懂得这一点,切忌把只适用于特定社会形态或特定历史条件的研究模式,当作一个不变的框架任意套用到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思想的研究中。恩格斯曾经对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过警告,他说:“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1〕

经济学的研究如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同样是如此。

西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一般说来都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关系是本质的关系,而商品生产又占主要地位,因此,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探讨,总是通过表现商品关系的各种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等,以及表现资本关系的各种范畴如资本、利润、利息等来进行的。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史著作,通常也都是按照人们对这些范畴的认识而写的。

但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此根本不同。它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历史时期。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开始,则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2〕。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主要地位。中国社会中早就有商品经济存在,而且,在很长的时期中,还比欧洲中世纪更为发达。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始终处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状态,商品经济不过是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同时,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2—483页。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不但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而且发展得比较畸形:它对封建势力处于严重的从属地位,同广大农村则缺乏经济方面的联系和交流。这样的商品经济,自身缺乏活力,不容易对封建经济发生较强的分解作用。

这种情况决定了对商品、资本关系的探讨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不可能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事物,不可能构成各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探讨的主要内容。

正因如此,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就不宜于,也不可能应用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普遍应用的那种商品—资本的模式,不可能按商品—资本有关范畴的认识的发展来写中国经济思想史。谁如果硬要照搬这种模式,他就不可能找到必要的、确实可靠的材料来说明问题,就会使整个说明、论证陷入支离破碎,望文生义的境地,而不可能科学地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揭示出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资本主义以前各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在这类社会形态中,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基本的经济关系不是资本关系,而是土地关系;生产的目的不是赢利而是使用价值,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奴役者的直接需要;所生产的剩余劳动的基本表现形式,不是资本的利润,而是封建地租。

中国的封建制度又有许多自己的独特之处:它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不是以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形式,而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地主主要是以实物地租的形式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同时,由于中国封建地主不具有完备的政治统治手段,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上层建筑——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社会中,维持庞大的

中央集权专制封建政权,必须有巨大的物质、经济手段,而这只能通过赋税、徭役从社会生产的剩余中瓜分而来。

这样,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就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地主(包括私人地主和代表地主阶级整体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和农民是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劳动产品划分为农民的必要劳动产品和由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剩余劳动在地主私人(通过地租形式)和地主阶级国家(通过赋税、徭役的形式)之间的划分,则成为经济关系的核心。

这些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探讨都不可避免地同土地所有制,同地主、农民和地主阶级国家的关系,以及劳动产品在地主、地主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划分这些问题,这样那样地联系着,经济思想的一切代表人物及各种有关的著作,都必然经常地涉及土地制度、地租及赋税、徭役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文献中,也颇有谈论商品、货币、市场之类问题的。但这方面的文献和土地制度——地租、赋税和徭役方面的文献相比较,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其受人们重视的程度来说,都不能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是,当谈论商品、货币、市场之类的问题时,人们更多地是从这些事物同农业、土地制度、地租、赋役等问题的关系而注意及之,不是把它们作为独立问题来关心和探讨的。

还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许多人谈论商品、货币、市场等问题,还往往是站在维护自然经济的立场,抱着消极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物。“重本抑末”、“废钱”、“废银”之类的主张,所以在漫长历史中频繁出现,并且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中处于正统思想的地位,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传统经济思想中所积存下来的历史资料,都决定了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

研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所常用的商品—资本的模式,而只能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自身的特点出发,把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及其剩余的分割形式(地租、赋税、徭役等),作为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逐步探寻适用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新的研究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土壤上产生出来的,又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滋养、涵育下成长起来的。

经济思想和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的观点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等,都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这一切组成部分,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1〕

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这种影响尤其深重,尤其显著。正确的认识并说明这种影响,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政治制度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许多重要特点,都是同中国封建时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作用和影响分不开的。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所以是国家本位的经济思想,人们探讨经济问题所以总是从国家角度着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以总是着重谈论“富国”,而较少谈论“富家”。财政、赋税等方面的思想所以特别发达……这些问题离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政权的作用是无法索解的。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些经济思想,如漕运思想,屯垦思想,轻重思想等,都是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政权这一政治制度方面的特

点分不开的。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即使是对待商品、货币、市场等方面的问题,也多是从国家管理财政、经济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对商品、货币、市场等问题的微观分析所以较少,这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哲学、文艺、道德、政治观点以及宗教等意识形态,都比经济思想更为发达。它们对经济思想的影响,也往往超出经济思想对它们的影响。在许多民族的封建主义历史阶段,经济思想往往包含在宗教教义中,作为宗教思想的附庸而存在。经济思想还受着道德规范的严重制约,强调经济思想必须服从于伦理道德规范。贵义贱利论所以成为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束缚经济思想发展的正统经济思想的神圣教条之一,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大量的经济思想往往不以直接形式(直接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或论文)出现,而是广泛存在于国家政策、宗教经典、哲学或伦理著作以及诗歌、小说、戏曲及其他文艺作品中。在中国古代,许多对经济思想有重要作用的人物,都没有论述经济问题的专文(更不用说著作了)。因此,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决不能只注意于经济著作、经济论文等直接的思想资料,而忽略了零散地广泛存在于各种非经济文献中的思想资料。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政治制度和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对经济思想能有更大的影响,它们之所以更受人们重视,主要是由于:

第一,这些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发展缓慢,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是在长时期中以难于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必然造成经济思想不够发达,经济思想对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宗教、艺术等的影响不够显著等特点。

第二,经济生活是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舍此就难以生存的一种活动,但

是,也正因如此,经济生活又往往被看作日常小事而不受人们重视。

第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某些社会形态中,人身依附及超经济强制起着突出的作用,而生产力的低下又使人们比较愚昧,因而使直接体现暴力统治的政治制度,使能够对被统治群众具有恫吓、愚弄及麻醉作用的有关意识形态,容易受到重视,使它们对经济的反作用容易被强调,被夸大。

第四,奴隶主、封建主都有鄙视经济的偏见。在他们看来,经济工作是他们的家臣以及奴仆们的事情,如果让他们这些高贵的人亲身操持,在他们看来就是有损体面,有失身份的事情。在这种偏见的支配下,探讨经济问题的思想、学术,自然就不会受到十分重视。

研究经济思想史,还必须注意经济思想本身的纵向联系(历史时间先后)和横向联系(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经济思想虽然以经济为基础和根源,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经济自身“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1〕,而只是“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2〕。一个时代的经济思想总是要以内部(本民族前代)或外部(其他国家或民族)已有的经济思想作为出发点,依据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已有经济思想进行分解、吸收、加工和改造,以建立起自己时代的经济思想。

从经济思想的纵向联系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史连续数千年未断,经济思想遗产极其丰富的国家,自然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横向联系问题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大大超过纵向联系(例如鸦片战争以来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受外来影响不大,横向联系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这

一点在前面已分析过了。

从社会经济的状况来揭示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社会内容,重视政治制度和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同经济思想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考察经济思想在发展中的纵向和横向联系,了解已有的思想资料对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所必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至于科学研究所常用的一些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等,以及整理中国文化遗产所常用的一些方法,如考证、校勘方法等,也都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恰当地应用各种必要的方法,使其在研究中互相配合,各得其所,才能逐渐在探寻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方面不断有所前进。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统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从夏代到春秋前期(公元前 22 世纪至公元前 7 世纪)。这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度的时期。奴隶制社会形态在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中国的奴隶制时代,不仅土地国有,工商业也由奴隶主国家经营(“工商食官”),文化也由“王官世守”,即由奴隶主国家垄断。这种情况使得生产力和文化进步都分外缓慢,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夏代的经济思想资料迄今还只在若干传说中存有一些,而无可靠材料。保存下来的可信材料为商及西周的某些文献如《尚书》及《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以及甲骨文、金文等,从中都可找到有关经济问题的某些观点或见解。但是,这些观点或见解都是极其零散的、片断的和直观的,少有申述和解说,更谈不上理论的分析或论证。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史前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色,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明显地表现。

第二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萌发的阶段,这一阶段大约

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即春秋时期的末期。

这一时期文献中所包含的经济思想资料显著增加。虽然经济思想的大部分仍然表现为一些零散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但对某些经济问题的议论已日益显著地超过前人。到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十年,已开始出现了个别在经济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其对经济问题的论述,已开始具有经济学说的特点,有的人物(例如孔丘)对多方面经济问题的探讨和议论,虽然形式上仍表现为一些零散的观念、范畴和原理,实际上从思想内容方面看已存在着一定的相互联系,因而其经济思想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已开始显露出来了。

第三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阶段。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思想是为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服务的,是为中国地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造舆论的。从春秋末期开始,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进入战国时期后,许多学派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改革社会经济的方案和主张,指陈时弊,批评其他学派的见解,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之间也各抒己见,互相批评、争辩。在经济思想领域中,这种异彩纷呈的局面,是当时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重要表现方面。这时,许多学者对经济问题的议论,都已经能够把若干方面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相互联系起来,并力求探求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儒、道、墨、法这些主要学派的著名学者,多半已能就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主要经济问题,提出自己较为系统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理论上进行一定的分析、说明和论证。他们的经济思想,大体上均已达到经济学说的发展水平了。